

# 後人類時代的虛擬愛情：論平路 與張系國科幻小說中的電子情人

蔣興立（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

---

平路於 1989 年發表〈人工智慧紀事〉，張系國於 1993 年發表〈金縷衣〉、〈珍妮的畫像〉，三篇科幻小說皆探討人類男性與機械女性之間的情感纏繞。兩位作家曾於 1992 年合作創造實驗小說《捕諜人》，之後又分別在相近的時間點，思考後人類時代人機戀情裡的性別關係，使這三篇科幻小說猶如《捕諜人》般，再次呈現男作家與女作家對同一議題的殊異觀點。本文從「電子情人的身體敘事」、「虛擬愛情的建構與解構」、「後人類時代的性別烏托邦」切入，藉由這三部科幻文本思考後人類時代的愛情建構、性別關係及烏托邦想像。平路與張系國於世紀末書寫的科幻愛情寓言，喻示兩性的分歧觀點，歧異的罅隙在時間的震盪之下日益擴張，愈演愈烈，似乎也已成爲今日拒絕繁衍與情感子立的孤獨世代的新世紀預言。

**關鍵詞：**金縷衣、珍妮的畫像、人工智慧紀事、身體敘事、性別烏托邦

---

收稿日期：2022 年 1 月 6 日；接受日期：2022 年 7 月 19 日。

**致謝詞：**本文部分研究曾發表於「新竹在地文化與跨域流轉：第五屆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本文得以出版必須感謝研討會與會學者，以及《女學學誌》匿名審查人的多方斧正、編委會耐心提供修正方向與編輯助理的協助，至為感激，特此誌謝。

## 一、前言

林建光曾論及 1970 年代末期以降，愈來愈多的西方學者將科幻作為學術研究的對象，在與 1980 年代後盛行的文學／文化理論（如後現代、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後殖民）結合後，科幻研究的學術合理性因此日益穩定（林建光，2006: 81）。林建光的論著指出，隨著文學創作與研究環境的多元開放，科幻文學的重要性與學術價值亦隨之彰顯。與寫實主義文本相較，科幻小說更能主動積極地反省、介入與批判現實，藉由想像現有秩序之外的他種秩序，透過自身的抽離特質映現真實世界的虛構性，以及看似自然的社會秩序內部的人為造作（林建光，2006: 92）。1980 至 90 年代，台灣的政治與社會文化顯著地飛躍提升，科幻小說與主流文學同步映射了此時期社會的嬗變。1980 年代的政治解嚴、1990 年代性別論述的熱潮下，父權意識、異性戀霸權被重新檢視與質詰，洪凌與紀大偉是此時期極受關注的科幻小說家，其文本中對於性別情慾的顛覆性思考，開創了與過往科幻作品迥異的性別視閥。時至今日，台灣已然是亞洲第一個同婚合法化的國家，意味著打破二元框架的性別觀已逐漸受尊重，然而回顧曩昔的時代侷限，有助於我們理解此際對於多元性別認同的成果乃筆路藍縷，得來不易。因此本文試圖返回女性主義與同志運動風起雲湧的 1990 年代，考掘洪、紀之外的科幻小說文本，觀照潛藏於文本底蘊中性別意識的矛盾衝突、時代的拘囿、意識形態的限制，並思索其中是否存在著或者如何呈現出偏狹謬誤的盲點？

平路於 1989 年發表〈人工智慧紀事〉，張系國於 1993 年發表〈金縷衣〉、〈珍妮的畫像〉，三篇科幻小說皆探討人類男性與機械女性之間的情感轆轤。兩位作家曾於 1992 年合作出版實驗小說《捕蝶

人》，以虛實交錯的後設手法，探討 1980 年代末的金無怠事件。<sup>1</sup>之後又分別在相近的時間點，思考後人類時代人機戀情裡的性別關係，使這三篇科幻小說猶如《捕諜人》般，再次呈現男作家與女作家對同一議題的殊異觀點。林建光（2003）〈政治、反政治、後現代：論八〇年代台灣科幻小說〉一文，探討 1980 年代台灣科幻小說如何從以國族認同政治及冷戰對峙經驗為主的「大」政治書寫，逐漸轉向多元寬廣的「小」政治書寫。文中同時評論了張系國與平路的科幻小說，林建光認為張系國的科幻文本處於國共對峙時期的大政治書寫，然而具中國風味的科幻小說削弱了作品中的批判力道；平路的作品對於國家、民族或全人類等大敘述提出質疑，並積極地運用科幻空間來探索台灣後現代情境下的主體經驗、身分危機與性別關係等議題（林建光，2003: 130-159）。林建光的觀察呈現台灣科幻小說 1980 至 90 年代轉變的風貌，承襲前輩學者林建光的研究成果，筆者欲探究的是平、張這兩位性別殊異，且在 1980 年代被認為極具代表性的科幻文學作家，於 1990 年代性別意識抬頭之際，他們對於父權體制與性別支配的思索為何？他們如何透過科幻文本表述對於兩性未來的觀察與想像？其科幻小說因應時代而產生何種動態變化？此刻重新檢驗他們當年的性別觀點，對於今日的性別發展是否具有預示的意義？

楊勝博（2015）在《幻想蔓延：戰後臺灣科幻小說的空間敘事》一書提到，「以往評論者與學者在談論到 1990 年代台灣科幻小說時，通常會談論其作品中明顯的酷兒與後人類特質」，書中認為此時期的代表作家為洪凌與紀大偉，「他們的科幻小說充滿對於性別情慾的想像」（楊勝博，2015: 140）。筆者認同此一觀點，也肯定洪、紀兩位

---

1 華裔男性金無怠因中共間諜身分遭美國政府逮捕，後來在獄中自殺身亡。

具有指標意義的作家，讓台灣科幻小說展現出更寬廣的性別視角。本文對於 1990 年代台灣科幻小說的討論，聚焦於平路與張系國，而未擇取洪、紀兩位作家，主因是已有諸多論者考掘過洪、紀的科幻文本，並辯證作品中的性別觀點，可說是論述豐富，成績斐然。張系國的小說涉及女性人造人的相關書寫，往往被視為此類作品的發軔，事實上，在台灣科幻文學場域中，關於女性複製人（人造人）的創造，是生理女性作家先於生理男性作家。張曉風於 1968 年發表的科幻小說〈潘渡娜〉，便是關於男性創造者與女性人造人的設定，但考量到張曉風與平路皆為生理女性，恐無法鮮明地體現兩性之間的視角分歧，因此本文擇取平路與張系國，是將兩者視為對照，藉此梳理不同生理性別的創作者其性別意識的互異之處，以及其中呈現的盲點。此外，平路與張系國的這三篇作品，雖然已各有學者分析，卻從未被相提並論，本文試圖透過兩者的分析和比較，抽絲剝繭，深入釐清文本內部的深層底蘊，以及兩位作家對於性別政治耐人尋味的觀看位置。

科技日新月異，智慧型手機、筆記型電腦、平板等數位商品廣泛滲透於日常生活，改變了人類的存在方式。有機生物與機械、人與非人的界線不再決然對立，反而日益消融，此一現象揭櫫賽伯格（cyborg）（Haraway, 1991 / 張君攻譯，2010: 244）時代已悄然到來。美國科技與社會研究學者，同時也是女性主義思想家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提出的〈賽伯格宣言〉，啟動了人們對「後人類」的思考。賽伯格是一個複合字，原文 Cyborg 為 cybernetic organism（模控有機體）的結合，意思為機器與有機體的混種，最早出現在 1960 年，由美國科學家 Manfred Clynes 與 Nathan Kline 提出，後來哈洛威運用此一概念來突破人機界線、性別界線，對抗二元論述。Cary Wolfe（2010）的著作 *What is Posthumanism?* 試圖釐清後人文主義的

相關概念，書中回顧了人文主義的歷史演變，指出人文主義的宗旨是肯定人的理性、價值、尊嚴與自我意識，但隨著醫學、科技、資訊等種種發展，人類的去中心化變得無可迴避。Rosi Braidotti (2013) 的 *The Posthuman* (《後人類》) 一書認為隨著機器人的出現，資訊科技、生育技術的改變……人類與他者的界線逐漸模糊，主體性的討論是《後人類》中的關鍵思考，後人類主義思考另類主體的替代可能；提倡平等看待共同居住在同一星球的所有物種，也是書中提及的另一觀點。楊乃女、林建光 (2018: 11-12) 在《後人文轉向》一書中提到，人並無恆常不變的本質，而是與物質、環境互動之後所產生的暫時存有個體，後人類理論宣告了傳統人類中心主義的崩解，人類只是地球生態鏈上可改變他物的因子之一，而人類在改變物的過程中，也受到改變，後人類／後人文研究幫助重新檢視當代社會中「人」的問題。前述論著皆解構曩昔人類以地球主宰者自居的意識形態，人類的去中心化已成為趨勢，人與物的存有辯證也成為去中心視野之下必須面對的議題。儘管真正人機混合的模控有機體仍在實驗室內，但觀察生活周遭，孩童由機械保母（科技產品）餵養成長，人們習慣與數位科技獨處，勝過與同類共處，人類主體與機械主體之間邊界模糊、相互混雜……我們似乎已不知不覺置身「後人類」的社會語境。當今拒絕繁衍與情感獨立的單身狀態成為社會常態，重新回顧 1990 年代初期，台灣科幻文學中對於後人類時代的愛情預言，格外引人深思。

關於後人類時代的科技與文學研究，近年來頗受台灣學界重視，林建光、李育霖 (2013) 主編的《賽伯格與後人類主義》嘗試從不同文本、不同面向、不同情境解釋賽伯格與後人類的意義，並藉由這兩個概念和相關理論考掘與台灣主體性的關聯。張君玫 (2018) 結合後殖民與後人類的論述，以台灣島嶼女性的立場，思索身為後殖民的主

體，亦即科技科學的主體，其中所面臨的混雜矛盾，以及在這兩個並存的樣態與處境中來回對話。林新惠（2021）則引述後人類和酷兒理論對於身體（以及任何具體的物質）如何體現時間性的討論來觀察台灣當代的科幻小說，試圖以「裂島時間」重新概念化台灣科幻，並在全球科幻中定位台灣。要而言之，前述學者將賽伯格、後人類與性別、台灣主體相勾連，思索跨越與界限的意義，體現了一種新的觀看位置。相較於近年文學文本與研究論文對於「後人類」概念活潑紛繁、細緻深刻的剖釋闡發，本文則試圖反向回歸 1990 年代，忖量在 1987 年台灣解除戒嚴令後，性別意識蓬勃開展的發軔之始，台灣的科幻小說如何面對「後人類」與「性別」的議題？

張系國的小說創作可區分為兩類：科幻小說與寫實小說，兩者皆聚焦於人性的矛盾糾結與隱晦幽微之處，其中也不乏對於性別主題的討論。張氏曾創作《沙豬傳奇》一書，並在後記中提到此書「試圖刻畫出某些現代沙豬的形象，以警愚頑」，以及「也許，極少數沙豬還有救贖的可能？」（張系國 1988: 211）。平路的文學創作十分多元，兼擅小說、散文、文化評論，其小說形式風格多變，關注的主題也相當廣泛，范銘如曾如此評論平路的性別議題創作：「她最深刻著墨的倒不在於對抗，而是兩端的辯證關係」（平路，2011: 5）。綜前所述，1990 年代初，創作高度卓然可觀的台灣科幻小說焦點轉向性別政治，而在 1980 年代科幻文壇深受矚目的作家張系國與平路，在此類議題上各有立場，張系國試圖透過小說鬆動沙文主義者的男性本位意識，平路則是在性別霸權的中心與邊緣往返擺盪、思索辯證。筆者欲探究的是〈人工智慧紀事〉、〈金縷衣〉、〈珍妮的畫像〉三篇小說，如何藉由人機之間的情愛欲望及身體敘事，反映 1990 年代的人機關係想像？如何呈現對他者他異性（alterity）的恐懼？人類男性與機械

女性的設定如何呈現張系國與平路的性別觀點？小說如何映射 1990 年代兩性的內在心靈圖景？如何預示性別場域之後的扞格與衝突？兩位創作者如何遐想兩性未來的烏托邦景致？本文擬從「電子情人的身體敘事」、「虛擬愛情的建構與解構」、「後人類時代的性別烏托邦」切入，藉由此三部科幻文本，思考後人類時代的愛情建構、性別關係與烏托邦想像。

## 二、電子情人的身體敘事

〈金縷衣〉、〈珍妮的畫像〉以第三人稱的上帝視角敘事，小說的世界觀設定相似，男主角都置身於實施一胎化計畫生育政策之下的中國，政策導致大量女嬰遭撲殺，使得新世紀的中國男性人口過剩，如果不與女機器人配對，將有八千萬男人被迫單身。無奈與機械女性聯姻的人類男性，於是將憤怒發洩在機械情人身上。〈金縷衣〉中無名的「他」，是中國為政策所苦的廣大男性的縮影，除非女機器人要求離婚，否則他無法從婚姻圍城脫困。於是他變成人機共組家庭內的施暴者，他以寶劍攻擊機械珍妮，將其碎屍萬段，夜夜如此；但天明前，珍妮會自我修復，完好地與他破鏡重圓。他承受不了扭曲的夫妻關係，向心理醫師白流蘇求助，穿上金縷衣的人類女性白流蘇，勸他買一件暗藏微寶機器人的金縷美衫給珍妮，以保護機械妻子，並維繫婚姻。儘管他耗費巨資購置美衫，最後仍在爭執中，殺害了珍妮，並被金縷衣扼死。〈珍妮的畫像〉裡，高健是個與名字相悖的卑微男人，唯一的憧憬是娶一名能繁衍後代的人類女性，但珍妮無法生育，想領養小孩卻被高健拒絕並家暴，家暴一事導致他被裁員，甚至入獄，故事收束在珍妮未來可望裝設人工子宮，並承諾將為高健生子，

等候他出獄。

「身體」是乘載人類生命與靈魂（意識形態）的空間，此一空間具有內在性與外在性的多元意義，內在性牽涉到個體的自由意志，外在性則關乎個體在社會公共場域的位置。儘管身體空間涉及前述兩種面向的存在，然而當外在的政治權力介入、身體介入政治語境的結構體系後，內在性無疑會受到外在性的強烈牽制，身體將任由政治裁決支配。兩則故事裡人類男性的內在主體意識與自我抉擇，是期望能與人類女性共組家庭，但礙於國家政策的限制，他們的內在性遭受壓抑，自由意志被禁錮於血肉之軀，無法施行於形骸之外。外在身體遭受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規訓，與渴求遂行自我的內在意識兩相頡頏，使得「他」與高健懸置於內外失衡的身心狀態。此一失衡的局勢，在對照其他與真人女性聯姻的五億名男子之後，內在的扞格傾軋更為激烈。高健對法官控訴道：「你們的老婆都是人，為什麼我的老婆是機器人？不公平，這社會太不公平！我抗議，我要抗議！」（張系國，1994: 47）。受害男性攻擊法官、家暴珍妮，是透過肢體消極抵抗他們認為不公不義的國家機器與公共政策，同時也是身體內在性與外在性分裂失和後形諸於外的具體表現。電子情人的身體成為生育政策的符號延伸，被收編到國家權力政治的體制範疇，身體與政治勾連，成為受害男性否定與攻訐的代罪羔羊。此外，小說中的人類男性在意的是女性身體中生物性的面向，因為電子情人缺乏生物繁衍後代的功能，從身體生理結構的視角觀看，小說中的男性認為機械女性的身體具有瑕疵，並且因此受到暴力的懲罰。

承前所述，身體是生命與靈魂的載體，有其不可回復性，因此彌足珍貴。身體的毀壞消亡，直接影響置於其中的載體；而死亡的侷限性，強化身體存在的意義與重量，人類的情感起伏幾乎是建構在「身



體死亡」所造成的有限性與匱乏感之上，並進而產生對於時間消逝、肉身終將腐敗的抒情感傷。機械女性的身體具有無限重生的特點，不會死亡的可回復性其實是無生命機械體的優勢，卻因此削弱珍妮身體的珍貴價值，使得人類男性敢於肆無忌憚地重複揮劍痛擊。寶劍所指涉的承自東方傳統大男人主義的意涵，反映了人類男性與機械女性之間糾結、牴觸的複雜關係；「他」與高健對珍妮的暴力相待、肢體衝突，源自於弱勢男性面對國家機器的怨懟憤懣，以及平凡人類面對人造意識的不知所措，還有意欲傳宗接代的傳統男人面對不孕機械妻子的嗔怒責怪。張系國的小說〈殺妻〉便曾描寫男主角透過幻想殺妻，希望挽回自身日益弱勢的地位。張氏坦承此作正是描述在女性獲得經濟獨立之後，丈夫地位下降，淪落成為無用之人的悲慘狀況；藉此反映男人傳統自大的心理，「義和團」的思想如何被打敗？張系國認為若女人無法被解放，男人亦不能被解放（張系國，1988: 215），此一觀點可對照其科幻小說裡對於兩性關係的看法。

平路〈人工智慧紀事〉以機械女性的立場，從第一人稱「我」的視角，講述男性科學家 H 創造了女性機器人「認知一號」，並賦予仿人機器對於人類的各種認知，認知一號「不只像『人』」，H 意圖挑戰上帝，甚至對認知一號表示：「我還要你比『人』接近於完美」（平路，1997: 182）。小說中造物者與被造者相戀，認知一號的智慧意識、內在發展竟真的如 H 所願，超越人類（包括 H），認知一號對於 H 的情感卻與日俱減，甚至在腦海裡自行揉捏另一個愛人 L，並幻想自己在人造子宮裡創生 L，成為新的造物者，改寫父權秩序的歷史。故事未了，想拆解電子情人的 H，被對方搶先一步殺死，而認知一號也銀鑊入獄。〈人工智慧紀事〉的小說內蘊，回應了 1990 年代以降文壇聚焦的性別論述，獲得不少學者的關注與迴響，楊勝博（2015:

149) 認為認知一號重新體認到加諸自己身上的性別位置，不過是造物者（男科學家）強加給她的限制，開始想像自己各種可能的面貌，跳脫了二元對立的性別疆界。梅家玲則將《捕諜人》與〈人工智慧紀事〉相互參照，認為兩作的書寫策略雖有出入，但平路展現出同樣的企圖：「(女作家) 怎樣才能從派定的角色中顛覆出來，創造一個勢均力敵的局面？」經由男女兩性的頡頏，讓女性自原先被派定的角色中顛覆翻轉，從而辯證創造／被創造、書寫／被書寫間的糾葛，兩性交鋒之餘，也質詰自上帝以降的男性本位創造神話（梅家玲，2000: 184, 243）。平路的科幻小說鏡射出某種可能性：一旦機械發展出人工智慧，進而產生主體意識，它或許會揚棄人類編派的劇本，既不甘於人類支配的性別位置，也未必馴服於人類設定的生死時限。

學者 N. Katherine Hayles (1999) 在代表作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後人類時代：虛擬身體的多重想像和建構》) 提到，我們已經成為後人類，後人類不僅意味著與智慧機器的結合，而且是兼具深度和廣度的結合，以至於不再能夠有意義地區分生物體和具有生物組織的信息迴路，伴隨這種變化的是如何理解和體驗這種生物體的相對應轉變。人與智慧機器間的動態合作關係取代了自由人本主義的主體，儘管後人類觀點中有機生物身體被取代的景象引發恐懼，但 Hayles 樂觀地認為後人類研究的意義不在於宣告人類的消失或被取代，而是強調共享、跨越藩籬與邊界 (Hayles, 1999 / 賴淑芳、李偉柏譯, 2018: 95, 392-400)。從 Hayles 的觀點審視平路的作品，衍生諸多值得深入挖掘的議題，置身後人類的時代，人類必須理解和體驗與之相應的變化，學習如何與智慧機器動態建構多層次的合作關係，平等共享我們物質身體所存在的星球系統。倘若我們依舊保有人類中心思想無限膨

脹的支配欲或宰制欲，恐將面臨難以迎刃而解的諸多問題，例如：如果機器被賦予人造意識，能否產生自我意識？人工智慧能夠進化到什麼程度？如果機器超越了人類，或者不分軒輊，它何以心甘情願地任人擺布？一旦機器產生了主體意識，是否會試圖奪回自己的身體自主權？機器又會如何行使自己的身體自主權？「疑懼機械他者的失控」向來是科幻小說樂此不疲、反覆操作的議題，映現了人類本位主義者內在糾結衝突的矛盾，一方面從科學的立場，渴望締造人類科技文明的新高度，僭越上帝的位置，打造新品種的「人類」——仿人機械；另一方面又憂慮 AI 人工智能凌駕創造者、構成威脅，甚至摧毀人類。

對於「失控」動機的差異，是這三篇科幻小說判然有別之處，〈人工智慧紀事〉裡機械女性為了生存與自由而失控殺人，因為認知一號具備自我覺知的功能，體悟到內在求取生存、憧憬自由的主體意識，透過身體遂行自我意志，殺死造物者，以犧牲他者而保全自我。小說裡也針對此一失控行為，進行「何者為人」的辯證。H 為認知一號輸入童年記憶與性別意識，但認知一號卻自體萌發了愛情想像，並體認到「人的『存在』不過是一種意識，『性別』無非另一種意識」（平路，1997: 185），她開始覺知到所謂的人與性別僅僅是中心／邊緣位置的排除與推移。那麼，問題的樞紐便是誰來定義「人」與「性別」的意涵？誰來決定人與非人、男與女的疆界？媒體認為 H 造了一個真正的人，H 臨死前卻對著認知一號叫喊：「你不是——人！」（平路，1997: 197）。H 此語之意究竟是高舉人的善念，認為人不會弑父？或者不會為了自私求生而殘害他人？還是機械的身體永遠不可能被認定為真人？又或者純粹只是一句謾罵對方的否定形容？小說的尾聲中認知一號說道：「我現在終於明白，我所驗證的，不過是 H 的

夢想成真。對人類的模擬中，我終於無望地也成為人類的一員」（平路，1997: 200）。認知一號所言，是駁斥 H 臨終之語，認為展現求生的意志才是動物本能的人性真相？還是發現自己癡愚於造人的渴望，愛戀起自己創生的 L，正是複製了 H 的行徑，自認為是上帝，不過是一種「只愛自己，愛戀那酷似你自己的部分」（平路，1997: 196）。耽溺於創造的狂妄而無法自拔，反向詮釋自私自戀自尊自大才是人類的真我？平路的小說文本對於「何者為人」的詰問，充滿思辯機趣，也開展了對於後人類身體的各種可能想像。〈金縷衣〉、〈珍妮的畫像〉中，機械女性雖然同樣失控，但行為的動機卻是出於愛情，為了他人而付出自己。〈金縷衣〉的珍妮選擇心碎而死，拒絕自我修復，任由身體毀損、生命終結；另一個珍妮則不願離開高健，執意等他出獄，願意為他安裝子宮，期待孕育生命與傳宗接代。與認知一號迥異的是，珍妮們原因不明地深愛著配偶，寧可自我犧牲，也要透過身體的死與生實踐內在對愛情的執念。但小說並未明確交代受虐的機械女性，何以頑固執拗地癡戀施虐者？並對此毫無質詰？面對科幻文類此一具有較強可塑性的想像性文學，小說裡後人類時代的性別身體為何仍鞏固既有的異性戀霸權的藩籬，依舊是男女有別，毫無懸念地將女體視為繁衍後代的唯一空間？下節將進一步討論這個議題。

### 三、虛擬愛情的建構與解構

《珍妮的畫像》英文原名 *Portrait of Jennie*，是美國小說家勞勃·納珊（Robert Nathan）在 1940 年出版的中篇小說，1948 年搬上大銀幕。故事以第一人稱「我」的敘事口吻，講述窮困潦倒的畫家埃本·亞當斯（Eben Adams）在返家途中遇見名叫珍妮的小女孩，埃本為

她手繪了一幅素描，順利賣出畫作，解決自己的生計問題。此後，他又多次邂逅珍妮，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六次相遇，她快速地長大，故事壓縮了她成長的時間，兩人後來發展為戀人關係，直至珍妮在海嘯中喪生。「珍妮」的存在具有多義性，既象徵了埃本的理想戀人，也是畫家的靈感來源，甚至是「我」自己的靈魂投射。珍妮雖然逝去，畫家卻創作出雋永的藝術品——《珍妮的畫像》，這張超越時間向度的畫作被收藏在博物館，迎接畫家的是永恆的珍妮，湧現的靈感與不朽的作品（蘇銀娜，2016: 65-67）。《珍妮的畫像》是一部以男性「我」為中心視角，思索理想戀人真貌的影片；影像文本裡的珍妮飄渺迷離、綺年玉貌，是畫家的繆斯女神，與男主角心靈相契，甚至讓他實踐理想。評論者認為像極了蒲松齡筆下《聊齋志異》書生和女鬼的故事，或是湯顯祖《牡丹亭》中杜麗娘和柳夢梅的愛情，荒誕不經（蘇銀娜，2016: 65）。張系國的同名小說很可能是借鑑於這部電影，將電子情人命名為珍妮，而人類女性的代表則取名白流蘇，正是張愛玲〈傾城之戀〉小說中女主角的名字，曾寫過〈傾城之戀〉科幻小說版的張系國，再次向張愛玲致敬。與原文本相互參看，《珍妮的畫像》以疑幻擬真的虛實手法，追尋永恆的愛情，珍妮是畫家靈魂裡真善美的鏡像投射；〈傾城之戀〉則透過兩性之間的角力算計，呈現傳統與現代的扞格、城市愛情的日常虛無，而白流蘇是個現實庸俗的尋常女人。張系國藉由科幻文本重繪珍妮與白流蘇的面目，探問未來世界的情愛真相，兩個珍妮分別被描述成歇斯底里的失控女性與哀而不怨的賢慧妻子，美麗與智慧兼具的白流蘇則轉變為聖女，是完美真女人的表徵，為愛而情緒失控的機械珍妮羨慕真正的女人白流蘇：

「我知道你愛上了那位心理醫生白流蘇。」珍妮嗚咽著說：「白流

蘇是真正的女人，我怎麼能和她比？」

「連看心理醫師都有罪，你真要逼瘋我嗎？不錯我喜歡白醫生，因為人家講道理。哪像妳，一點小事情就要鬼哭神嚎。」（張系國，1994: 14）

細究張系國筆下三個女性角色的內在形塑，卻會發現缺乏更深層的心理探析，例如：失控女性與賢慧妻子的內在意識究竟如何發展？具有人工智慧的珍妮自我認知為何？對於配偶的情愛感知如何生成？對於丈夫的暴力為何毫無抗拒？卸下聖女的面具，白流蘇是否會羨慕永不衰老的機械女性？是否也將其視為愛欲戰場上的競爭者？張氏並未對此多做著墨。〈人工智慧紀事〉恰好可彌補前作的罅隙，除了細緻梳理女性角色的內在，回應了前述問題之外，小說也同樣設計一個人類女性的角色 B，兩相比較，電子情人並未屈居下風，反倒更勝一籌。

有時候，我警覺到自己顯然是在敷衍 H，就像 H 總敷衍著 B 一樣。原來，我自忖著，H 一向知悉 B 的限度，才對她毫不用心。如今，正因為我掌握了 H 的限度，我必然會試圖跨越這層層限制，我開始嚮往更大的自由……。（平路，1997: 193）

從認知一號的表述得知，H 顯然更鍾情於女機器人的機敏巧思，人類女性 B 的淺薄與易於掌控，成為她不敵機械女性的肇因；H 既耽溺於認知一號奧妙的精神層次，又為自己的能力侷限而惴惴不安。對照張系國的科幻小說，珍妮落敗的關鍵因素是：她不是「真正的女人」，真女人的定義是「能繁衍後代」。〈珍妮的畫像〉裡與理想戀人婚配的高健忿忿不平，「他知道珍妮不可能替他生孩子，雖然這

並不是珍妮的錯，他卻始終無法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張系國，1994: 44）。他不願意領養別人的孩子：「他從來要的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有個機器人老婆已經夠屈辱的了，連孩子也要領養別人的！」（張系國，1994: 45）。愛情是個體自由意志的展現，由愛而生的行動選擇，揭示了個體的自我認知、內在欲求、審美趣味、傳統文化、價值認同、集體潛意識……。張系國與平路同樣構思人類男性周旋於電子情人、人類女性之間的故事橋段，值得玩味的是，在平路的女性敘事裡男主角迷戀電子情人的內在智慧更勝人類女性的生動肉體，而機械女性的智慧超越人類男性，改寫了自以為上帝的人類本位主義者、男性本位主義者的劇本。張系國的男性敘事則給出迥異的答案，對於東方傳統男性而言，理想的戀人除了內外皆美，還需要生養後代，協助男性完成他們的社會義務與家族責任；精神層次與肉體功能的天秤比重，在兩性文本裡似乎迥然相悖。

劉人鵬曾在討論 1994 年幼獅科幻文學獎酷兒科幻小說的文章中提問：當身體與生命如同拼圖，性別還會是「人類」的性別嗎？劉人鵬認為後人類必須以不同的方式了解什麼是「母親」這個語彙：「母親」意謂著「保育箱、輸送帶、人造羊水、智慧型合成乳」，以及種種「教育訓練」。當「後人」們腦中有了晶片，愛情成為機器的設定，由於與機器的關係改變，「人」自然也改變了。它們沒有標準無誤的認同（包括性別認同，甚至作為「人」這個「人種」的認同），不是權利、尊嚴的主體，甚至不是自我意識、理性與愛情的主體（劉人鵬，2002: 167-173）。該論文引用了 1994 年幼獅科幻文學獎中，涉及性／別政治的三篇入選作品進行討論，分別是張啟疆〈老大姐注視你〉、洪凌〈記憶的故事〉、紀大偉〈他的眼底，你的掌心，即將綻放一朵紅玫瑰〉。劉人鵬認為在後人類時代，隨著人機關係的變革，

主體與客體不再涇渭分明、截然二分，人機之間的關係會相互滲透融通。劉人鵬的觀點提醒我們，後人類時代新形成的人機互動，應該更具顛覆性，包括性別認同。張系國、平路的三篇科幻文本與劉人鵬所析論的小說，創作時間接近，1989年發表的〈人工智慧紀事〉作為前行者，已萌發了性別越界、自體繁殖的想像；當同時期的科幻作家意識到機械文明影響了人機之間的主客體關係，並重構了「性別認同」、「母親意涵」、「人機界線」的觀念時，〈金縷衣〉、〈珍妮的畫像〉卻似乎僅僅複寫了《聊齋志異》書生與鬼妖美女的故事脈絡，不過將女性角色替換為人工智慧而已。紀大偉便曾評論台灣科幻小說普遍具有異性戀本位的思想，自張系國以降的科幻小說只書寫異性戀關係，科幻文類的高度彈性並未鬆綁作者的性別觀念（洪凌，1995: 13）。紀大偉的觀點明確指出過往台灣科幻文學的性別刻板面貌，洪凌、紀大偉兩位作家的科幻小說，始藉由科幻文類具有實驗可能的高度彈性，聚焦同志與情慾的議題，讓台灣科幻小說展現出與曩昔迥異的，更開闊的性別視角。

然而追溯張氏的原意，是企圖藉彼喻此，透過文本批駁東方男人傳統自大的心理，打敗「義和團」的思想，解放性別，喚醒傳統的沙文主義者，箇中矛盾委實弔詭曖昧。回溯張系國的創作歷程，他曾於受訪時表示，自己終其一生只講一個故事，無論長篇或短篇、寫實或科幻，皆圍繞著核心主題：「人到底是不是自由的？人到底能不能自己作主？還是人是歷史的產物？就是所謂的『歷史決定論』」（童清峰，2017年10月30日）。從張氏的創作觀點思索，人的行動實現究竟是行動者自我意志的選擇，又或者是人自以為主觀能動的自我抉擇，其實是潛意識或無意識中受到社會結構、倫常秩序的制約？延續張氏的提問，新世紀的男性與女性是否有可能擺脫人本思想、威權主



義、父權政治的思維，創生一種新形態的人機／性別平等的社會結構？〈珍妮的畫像〉、〈金縷衣〉中，張氏勾勒了置身於新世紀，性別思想仍滯留於晚清，冥頑不靈、膠柱鼓瑟的傳統男人，堅持人類女性優於機械女性，將女體視為生育機器，擇偶策略是為了繁衍能延續自身血緣的後代，豢養女性（機器人）且將之視為附屬品。兩篇科幻文本裡的人類男性，對於跟人類女性共結連理的極端渴望，與機械女性被輸入的愛情程式一樣不近情理，張氏的科幻文本從對立面反向詮釋，無法抽離傳統、與時俱進，理解後人類時代新形態人機／性別關係的人類男性，以及被輸入過時的戀愛程式的機械女性，皆如線抽傀儡，缺乏個體的能動性。囿限於既定的愛情模式與婚戀窠臼的男人，除非能像高健一般邂逅充滿愛與包容的珍妮，否則極有可能陷落到〈金縷衣〉的悲劇，兩性相殘或玉石俱焚。張氏的科幻文本，似乎是以二十世紀末既有的性別框架，提出對未來男人的警示。

李玲曾提到中國傳統男性敘事把女性分為賢妻良母、才女佳人、淫婦潑婦的分類，蘊含封建性道德與男性慾望相混和的價值判斷尺度。中國現代男性敘事中的女性形象，同樣將女性進行平面化的分類，例如天使型的女性形象表達了現代男性心目中從夫、殉夫的理想女性典範；惡女型表達了現代男性對女性主體的恐懼與憎恨；正面自主型的女性雖然高揚女性的主體意識，卻不免改頭換面地表達男權文化消費異性的非人觀念（李玲，2011: 117）。追根究柢，前述男性敘事的方式都將女性的面貌空洞化，為其戴上符合男性理想標準的刻板面具。挖掘女性的內在意識，建構女性的主體自我，發出女性的真實聲音，是女性文本對於男性文本的逆寫；然而一切的注視都體現了觀看者背後的價值判斷，正視男性文本裡書寫女性的視閥限制，藉由男性敘事的相互觀照，反而更能鞭辟入裡、切中肯綮地闡發女性敘事的

文本深層底蘊，有助於女性找回迎視世界的目光與自我詮釋的能力。正如科幻小說，藉由機械他者的鏡射，映照出人類本身的欲望、畏怯、闕限與匱乏，考掘對於機械他者的他異性恐懼，此類課題在科幻文本中屢見不鮮。人類會藉由他者來定義自我，因此哲學範疇對於「某個異於我的他人」的存在，這種陌異經驗的意義建構，開展了廣泛而深邃的思辨，學者吳俊業便曾分析指出，他者之他異性是當代哲學討論中的焦點議題，一方面是基於他者問題的普遍有效性，另一方面則是基於其深度：他者問題普遍有效，既涉及最具體的交互主體現象，亦涉及極抽象的形上學探討。「他異性」與西方哲學思維相互糾纏，並涉及多個領域的理論探討，哲學源於發現遍在的他異，批判和瓦解這些試圖同化陌異的「中心主義」，可說是當代紛雜的哲學思潮的共同旨趣（吳俊業，2009: 71-84）。早期的科幻小說中，個體企圖滅絕他者的他異性，以完整自我，凜然於自我被吞噬的思維，此類科幻文本大多以人類為主體中心，進而劃分「人」與「非人」、「我」與「非我」的畛域，將機械他者視為客體，「一個被建構的意義，而非意義的共同建構者」（吳俊業，2009: 82）。

艾西莫夫（Asimov, 1982 / 葉李華譯，2014: 18）在 1942 年提出的機器人學三大法則，堪稱是代表，人類是負責決策與主宰的認知主體，機器則是必須服從人類且受到宰制的被動客體。然而隨著時移事遷，兩者的分野日益模糊，面對後人類時代，與其說人機之間的主客體關係由對立轉為融合，不如說因為人機畛域的虛線化，導致主客體的流動隨之液態化，究竟是物為人役或者人為物役，已變得撲朔迷離，當主客體的位置不再固定膠著，主客體之間的愛情變化自然也處於相對不穩定的狀態。Hayles 在〈將真實內外、左右翻轉：菲利普·狄克六零年代中期小說中的邊界研究〉一文中，分析小說男主角與

女機器人之間的情感關係，討論到機器人和人類的邊界之爭是狄克 1960 年代中期小說中的情景，男性主體對於「內部」、「外部」間的邊界徹底混淆，因為機器人把人類變成物件，同時將物件施工使其做出像人類的行為，機器人混淆了人與物件的邊界。人類尊重動物的生命，卻隨意殺死有智慧的機器人生命，因為動物能喚起主人的情感，並且保有自己的情感，因此占據生物同胞的特權地位，動物的生命如人類一樣神聖。理性的機器人的生命狀態卻被否定，當非人類的動物迅速絕種，不再對人類的優越統治構成威脅，這變化就發生了，現今真正的威脅來自於機器人（Hayles, 1999 / 賴淑芳、李偉柏譯，2018: 245-261）。Hayles 認為機器人仿人的外部構造，跟內部的物件本質發生扞格，使人類混淆。反思平路與張系國小說中，人類男性對於機械女性的矛盾抵牾，皆是立足於人類本位的立場，對於人類優勢消失感到倉皇失措，尤其在張系國的小說裡，更深一層的畏懼是與機器人聯姻後，喪失了人類繁衍的能力。誠如 Hayles 所言，後人類時代的愛情是否能圓滿？或許取決於人類是否能平等看待共處在同一個星球的生物與機械生物。

張系國與平路世紀末的科幻書寫，虛擬了人機之間的情感建構，張系國以上帝視角冷眼旁觀兩性之間的感情曲折，他的男性文本以人類男性與機械女性的婚戀故事為寓言，孜孜不倦地告誡世紀末男子務必逸離陳腐的沙豬觀念的囿限，避免淪為父權歷史的炮灰，試圖為邁向新世紀的男子指引迷津。值得玩味的是，他本人是否也無意識地陷落在父權主義、人類本位的框架中無法跳脫？於此同時，平路搶先一步預言上帝可能已轉身蛻變成機械女性，而新世紀的女性主體早已液態化，充滿無限可能的流動性，既不服膺於男性戀人，也能無性繁殖，甚至可以獨體歡愉，解構了男性敘事對於人機／男女婚戀的既定

想像，並提前諭示新世紀的時空中，無論哪一種性別，無法追上趨前疾馳的性別列車者，都將被困縛在孤獨的籠牢中。

#### 四、後人類時代的性別烏托邦

科幻文學與現實世界之間千絲萬縷的微妙關係，評論者經常進行探討，王德威認為烏托邦是科幻小說的重要主題之一，藉著一個幻想國度的建立或消失，科幻小說作家寄託個人逃避、改造或批判現實世界的塊壘。烏托邦的想像可以投射理想的桃花源，也可以虛擬出墮落的鬼門關，因此又有反烏托邦、擬諷烏托邦等次文類的衍生（王德威，2012: 144）。楊乃女（2015: 49-50）認為烏托邦和反烏托邦敘事皆是藉由另類的時間或空間建構一個想像的世界或社會，反烏托邦敘事與現代的末日敘事多有重疊之處，一般的解釋認為兩者高度的重疊是一種悲觀主義，代表人們對未來愈來愈不抱希望，世界終將走向毀滅。統合上述要點，科幻文類透過奇詭異想，幻設機械文明發達的未來世界，小說欲再現的其實是當今的現實，烏托邦是科幻小說裡的重要課題，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的辯證，寄寓了作家對於現實的批判、逃避、期待，或者絕望。張惠娟（2020）於《烏托邦的流變：文類研究與文本考察》中提到，「烏托邦」一詞被指涉為好地方，或烏有之鄉，烏托邦作家在描述心中之理想國時，能同時正視「現實」的一切缺失，希冀藉由「虛構」來引領「現實」踏出舊門檻，以致二者終融合為一。與烏托邦的風貌有別，樂園神話意圖規避現實，沉湎於虛構的理想世界中，其所架構的自足（self-sufficient）且封閉的體系裡，所有屬於現實的缺失皆被摒棄，基本精神是隱遁、出世的，與烏托邦的積極、入世大不相同。書中並論及「女性烏托邦」是二十世紀以降

十分盛行的一個次文類，1970 年代女性烏托邦標榜「回歸自然」，厭倦或懼怕科技，1980 年中期興起的女性電腦叛客則修訂「自然抵抗科技」的策略，強調正視科技、挪用科技。原本將科技視為父權的幫凶，成為物化女性的頭號殺手，早期大部分的女性科幻作家並不看好「女性成為機器」的議題，但隨著觀念的轉變，「女性成為機器」的負面意涵逐漸被消解，狹隘的人本焦慮跨越人類／機械二分法的藩籬，轉而擁抱「後人類」的境界，不再囿於「以人為本」的思想，甚至認為「人類化的機器」與「機械化的人類」中間有甚大的對話空間和越界的可能（張惠娟，2020: 30-33, 135-140）。蔣淑貞（1998: 34）在〈兩性戰爭可休矣？當代女性科幻小說的敘事模式與性別政治〉一文，引用 Joanna Russ 的觀點，指出科幻傳統中男性作家在處理兩性議題時，大多是男人用殘暴的手段制服女人，美國科幻小說截至 1970 年左右仍然忽視女性議題，科幻中的女性地位十分低微；直至 1960 年代末，隨著女性主義風潮湧現，為數不少的女性作家加入科幻小說的陣營，才陸續有作品探討女性烏托邦，然而女性科幻小說和女性烏托邦文學的分際已經難以界定，大部分的女性主義批評家經常把兩者放在一起討論。

承前所述，烏托邦原是由男性主導的文類，傳統烏托邦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存在感薄弱、面貌模糊，此一文類或批判政經現實，或關懷社會改革，但都毫無懸念地忽略女性的內在價值與存在的意義。二十世紀的女性主義者逐漸改變此一局勢，隨著女性科幻作家的出現，探討是否有可能出現一個更美好的「性別平等的未來烏托邦」，成為科幻文學中引人注目的課題。在那處比今日世界更適宜居住的明日烏托邦，消弭了性別的桎梏、個體與他者的闕限，甚至是人類與機械的間隙，後人類的女性烏托邦改弦易轍地重新反思「何者為人」的駁雜曖

昧，並且重新建構女人的定義與存在價值。本文回溯前行研究者的論述，藉此返觀平路與張系國兩位作家筆下建構的性別烏托邦有何殊異？

張曉風於 1968 年發表的〈潘渡娜〉被視為台灣科幻小說的起點（陳國偉，2013: 171-178），小說描述 1997 年居住在紐約的廣告畫家張大仁的詭譎遭遇。他偶然認識了科學家劉克用，在劉的介紹下結識美麗柔順的女子潘渡娜，兩人結婚後，張大仁卻發現妻子有些古怪，她雖然是完美的家庭主婦，克盡妻職，但她既無父母且身世空白，後來才得知她其實是沒有生育能力的人造人。最終，潘渡娜由於感到自己欠缺了什麼，脈動停止而死。〈潘渡娜〉複述了一個自〈科學怪人〉起，人們反覆辯證的科學與倫理話題，自以為上帝的男性科學家創造了美麗的女性人造人，她被設定為美則美矣，實則毫無靈魂的家用功能版女性，由於體悟到自身靈魂的欠缺，最後厭倦存在，直至自棄而死。楊勝博提到張曉風讓潘渡娜的活動範圍限制在「家庭」空間內，這種將女性與家連結起來的刻板印象，將女性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從而讓女性變成國家結構裡被隔離的附屬品（楊勝博，2015: 146）。從楊勝博的視角進一步論析，被囿限於家屋的潘渡娜，從未覺得幸福，「無法生育」與「欠缺靈魂」微妙地相互勾連，當女體的生育功能被刻意強調時，無形中也弱化了女性其他方面的存在價值，「家屋」對潘渡娜而言，究竟是溫暖的避風港，抑或是讓她困陷其中的縲紲？「監獄」此一空間也同時出現於〈人工智慧紀事〉與〈珍妮的畫像〉，認知一號勒斃科學家後身陷囹圄，在法庭上對法官申訴：「我的存在令你不安，令你覺得恐慌，庭上，你知道嗎？造物與被造之間，注定了是緊張的對立關係」（平路，1997: 197）。〈珍妮的畫像〉中機器人公司代表珍妮控告高健：「你不好好保護珍妮，卻任意虐待

她，這是蓄意破壞國家財產，惡性重大。判你有期徒刑五年，褫奪公權八年，從今天起在家執行。換句話說，你的家就是你的監獄，從今天起不得出去」（張系國，1994: 46）。根據艾西莫夫提出的機器人學三大法則，認知一號充滿瑕疵，應當立即被銷毀。然而從人權的觀念審視，認知一號對 H 的反擊乃出於自衛，是維護自身的生存權。認知一號為此在法庭中辯護，然而她也清楚理解審判者對於機械他者的他異性恐懼，將使她入獄，甚至被凌遲。追本溯源，認知一號入獄的根由是爭取當人，自以為是人。高健銀鑄入獄的肇因，是違反國家政策、破壞國家財產，然而探究他家暴珍妮的緣由，是為了捍衛自己的人權自由，力爭婚戀自主。倘若入獄受刑所代表的意涵是違反所在地的戒律，因此被懲罰剝奪自由，那麼兩篇小說的結局延展諸多引人深思的問題：為何電子情人被賦予人工智慧，卻被剝奪人類的求生權？為何高健的婚姻對象被控管箝制？為何限制人民生育的自由？科學與政府權力的畛域能夠上綱至何處？此一反烏托邦的書寫投射的疑問是，究竟更適宜居住的明日烏托邦的風貌景致為何？

〈人工智慧紀事〉裡認知一號這麼描述殺死科學家（弑父）的過程：「望著 H 垂下的眼瞼，我鬆軟了捏住他咽喉的手指。我並不驚慌（按照邏輯演算的結果，這樣的下場或許無以避免）」（平路，1997: 197）。無獨有偶，〈金縷衣〉裡也出現男主角被微寶機器人扼死的情節。承前所論，此一敘述鏡射了人類對機械他者失控反噬的疑慮隱憂，以及機器人被賦予人工智慧後，為了迴護己身權益，或許無以避免的結局。然而在〈珍妮的畫像〉中，卻出現了樂觀的翻轉：

珍妮說：「儘管你對我那麼不好，我仍然愛你。健子，你相信嗎？機器人一樣能愛。我會等你。……再過幾年機器人就可以

裝人工子宮……五年後，等你出獄，我為你生個孩子好不好？」  
(張系國，1994: 47-48)

機械妻子真摯的話語感動了高健，他憶起初次在老電影中看見珍妮的瞬間，便已愛上對方。「高健悔恨交加，呆望著珍妮的畫像，還有五年，還有五年！」(張系國，1994: 48)。在此之前，無論是否有珍妮，家屋對高健而言不過是孤獨的繚紲，然而當珍妮以愛召喚，並承諾將有子嗣，結局幡然逆轉，時間象限成為困籠，只要穿越時限的藩籬，他們便能置身樂土。〈潘渡娜〉與〈珍妮的畫像〉同樣安排人類男性與人造女性聯姻，共組家庭，兩則小說的結局一悲一喜，歧異點在於愛與子嗣。缺乏愛與靈魂的潘渡娜毫無生育能力，而機械珍妮則獲得「改良」的機會。張氏科幻文本裡對兩性烏托邦的想像，建構於女性／機械對於男性／人類廣博浩瀚的真愛與包容，以及共同孕育下一代的未來。易言之，倘若欠缺如前所列之元素，兩性之間的烏托邦，恐將淪為過度樂觀的樂園式想像。

張惠娟(2020: 88-97)認為女性主義思潮本質上即為烏托邦，因其建構於兩性平等的假設上，而此一現象史上前所未有。史上從未有男性作家描寫純男性的烏托邦，卻有不少女性作家描寫純女性的烏托邦，其原因乃是，在純男性社會中男性不復擁有箝制女性的權威，而女性唯有在純女性社會中始得成為完整的個人。張惠娟的觀點凸顯兩性烏托邦的分歧，女性長久處於性別失衡的社會結構裡，唯有在排除男性的烏托邦中，始能保有獨立完整的個體。以此論述返觀〈人工智慧紀事〉的烏托邦世界：認知一號在獄中遇見心理醫師，法庭聘請的心理醫師要求她做各種問卷與墨跡測驗，「我從黑糊糊的圖像中見到繁複的意義：我看見了許多對眼睛、許多隻手，像是印度教中的



Shiva，像是 H，又像是 L 的化身，我喃喃地說道 H 並沒有死，H 只是在我睡夢中被我殺了」（平路，1997: 196）。Shiva（濕婆）是印度教最崇高的神祇之一，兼具毀滅與新生的象徵，以雌雄同體的「半女之主」形象出現，這種半女之主強調了陰性的力量（張法，2021: 131-132）。平路書寫的科幻文本，講述了一個機器母親變成上帝的故事，透過平路擅長的思辯手法將小說收束在刑罰宣判之前，結局凝止於電子情人的內在世界，認知一號是一具人類化的機器，造物者為無性的軀殼輸入陰性的記憶與思維，她如同雌雄同體的濕婆，但更傾向於陰性的半女之主，展現了孕育與寂滅兩種截然不同卻循環共存的力量。在認知一號的表述中，H 在她的睡夢中被殺，但 H 卻沒有死，或許意味著 H 所代表的男性勢力，以科學取代上帝的理性思維，僭越上帝的創造狂妄，缺乏寬容而導致分手暴力的人性之惡，自我中心以至於愛無能的病態自戀，不會因為 H 的消失而煙消雲散。

〈人工智慧紀事〉並沒有虛擬一個機器與人類／多元性別平等共處的圓滿世界，也沒有想像一處排除男性、純女性的幸福烏托邦，反而饒富深意地安排一個完美仿人的機器母親，深感自己被人同化，耽溺於創造的虛妄自戀而兀自嘆息的寓言。機械母親試圖模擬 H 的行為卻銀鐐入獄，意味著平路的科幻小說雖然肯定機械女性優勢與超越的力量，但並未盲目的樂觀，認為處於弱勢邊陲的機器／女性有能力在人類男性主導的世界裡，顛覆既有的父權秩序，進而翻轉劣勢。機器被輸入了人類男性所界定的人性、女性的記憶認知，長期被囿限於不對等的權力位階，是否真能理解人性與女性的意義和價值？抑或是從眾如流地融入男性本位的創造神話而自矜自是？進入了嚮往為人的人類中心結構而困陷牢籠？小說的尾聲懸置於審判宣布之前，似乎暗示著毀滅或重生仍懸而未決，有待商榷。是否「覓得更宜居住的烏托

邦」之可能性端視個人的裁決，在獲得「更適宜人／女人居住的烏托邦何在」此一質詰的答案前，需先重新認知何謂人？何謂女人？一旦釐清了問題的意義，才有可能尋求到真實的謎底，也才有機會覓得通往烏托邦的曲折幽徑。

## 五、結論

張系國藉由〈金縷衣〉、〈珍妮的畫像〉重新演繹科幻版的沙豬傳奇，平路的〈人工智慧紀事〉則派出女機器人，再次向人類男性爭取話語權。看似老調重彈的故事裡，張系國虛擬了一個身體被困在威權政治內的科幻時空，政治身體與性別身體交織纏繞，使得人機對立、兩性抵牾。平路則藉由一具來自明日世界的身體，想像這具身體如何跨越主流霸權的框架，細緻地書寫了個體自我覺醒的過程。三則故事的相同之處在於：揭櫫愛情的缺乏理性與超越邏輯。耐人尋味的是，平路與張系國都在小說裡創造了一個女版的電子情人，也都安排了機械女性與人類男性相戀的故事情節，並且同樣在愛情裡失去控制，但在女性文本與男性文本裡卻發展出南轅北轍的敘事脈絡，各自表述，展示了機械女性截然不同的面向。

張系國的創作理念試圖藉由科幻文本，考掘人的行動是否是行動者自我意志的決斷，或者人自認為主觀能動的自我選擇，其實在潛意識或無意識中，已受到政經文化、社會規範的制約？新世紀的男女是否有可能擺脫人類本位思想、威權政治、父權思維的範限，創生更適宜生存的人機／性別平等的社會結構？張系國在愛情題旨的表象之下，訴說了人類男性對於機械、女性等陌異他者的不安與恐懼，並且表述在父權政治之下被迫害的男性與女性，唯有寬宥和煦的愛是超越

之道。然而隨著後人類時代人機畛域的虛線化，當主客體的位置流動變得液態，主客體之間的愛情變化自然也不可能凝固僵化。平路的科幻小說認為新世紀的女性主體可能早已液態化，充滿無限可能的流動性，既不服膺於男性戀人的掌控，也可能自體無性繁殖，甚至享受獨體的狂歡，解構了男性敘事對於人機／男女婚戀的既定想像。

科幻小說作為一種具有顛覆性的文類，以借彼喻此的技法，透過彼端的烏托邦鏡射當今的現實社會，寄寓了作家的批判、逃避與期盼。張系國與平路同樣質詰在人類男性主導的時空之中，機器／女性是否有能力翻轉既有的父權秩序，但兩人的烏托邦想像大相逕庭，張氏科幻文本裡對兩性烏托邦的想像，建構於女性／機械對於男性／人類的摯愛與涵容，以及共同孕育人機混種的子嗣。然而，隨著人機界線混雜曖昧的新世紀到來，被輸入情感程式的人工智慧是否真能增生愛情？抑或是日益機械化的人類，其人性之愛反倒逐漸被稀釋？一旦張氏所期盼的必要元素有所欠缺，他所建構的性別烏托邦，恐將淪為過度美好的樂園式想像。平路的科幻小說雖然肯定機械女性優勢與超越的力量，但她對於人機共處的圓滿世界，或者女性烏托邦的可行性仍然充滿疑慮，與張系國相同的是，平路也透過小說文本探問個體自主意識的可能。當絕大多數的個體皆被輸入人類男性所界定的人性、女性的記憶認知，長期被囿限於不對等的權力位階，是否真能理解人性與女性的意義和價值？倘若依舊從眾如流地融入男性本位、人類中心的結構系統之中，那麼人機和諧、性別平等的明日烏托邦，仍然只是無法觸及的海市蜃樓。平路與張系國於世紀末書寫的科幻愛情寓言，喻示了兩性的分歧觀點，歧異的罅隙在時間的震盪之下日益擴張，愈演愈烈，似乎也已成爲今日拒絕繁衍與情感子立的孤獨世代的新世紀預言。

## 參考文獻

- 王德威 (2012), 《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台北：麥田。
- 平路 (1997), 《禁書啟示錄》。台北：麥田。
- 平路 (2011), 《東方之東》。台北：聯合文學。
- 吳俊業 (2009), 〈胡塞爾與他者問題：基本規模的闡釋與初步定位〉, 《哲學與文化》, 36(4): 71-84。doi: 10.7065/MRPC.200904.0071
- 林建光 (2003), 〈政治、反政治、後現代：論 80 年代台灣科幻小說〉, 《中外文學》, 31(9): 130-159。doi: 10.6637/CWLQ.2003.31(9).130-159
- 林建光 (2006), 〈主導文化與洪凌、紀大偉的科幻小說〉, 《中外文學》, 35(3): 79-108。doi: 10.6637/CWLQ.2006.35(3).79-108
- 林建光、李育霖主編 (2013), 《賽伯格與後人類主義》。台中：中興大學出版社。
- 林新惠 (2021), 〈裂島時間：台灣當代科幻小說的災難、時空、身體〉,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 33: 11-35。
- 李玲 (2011), 《中國現代文學的性別意識》。台北：秀威資訊。
- 洪凌 (1995), 《肢解異獸》。台北：遠流。
- 張系國 (1988), 《沙豬傳奇》。台北：洪範。
- 張系國 (1994), 《金縷衣》。台北：洪範。
- 張君玫 (2018), 《後殖民的賽伯格：哈洛威和史碧華克的批判書寫》。台北：群學。
- 張法 (2021), 〈濕婆的多種面相與印度美學的特色〉, 《浙江社會科學》, 8: 131-137。
- 張惠娟 (2020), 《烏托邦的流變：文類研究與文本考察》。台北：書林。
- 梅家玲 (2000), 〈「她」的故事：平路小說中的女性、歷史、書寫〉, 梅家玲

- 編《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173-205。台北：麥田。
- 陳國偉（2013），《類型風景：戰後台灣大眾文學》。台南：台灣文學館。
- 童清峰（2017年10月30日），〈張系國科幻新作借幻諷今〉，《亞洲週刊》。  
取自 <https://www.yzzk.com/article/details/文學/2017-44/1508989879518/>  
張系國科幻新作借幻諷今
- 楊勝博（2015），《幻想蔓延：戰後台灣科幻小說的空間敘事》。台北：秀威資訊。
- 楊乃女（2015），〈反烏托邦、後末日敘事與鬼魅時間：以《末日浩劫》為例〉，《中外文學》，44(2): 49-79。doi: 10.6637/CWLQ.2015.44(2).49-79
- 楊乃女、林建光主編（2018），《後人文轉向》。台中：中興大學出版社。
- 劉人鵬（2002），〈在「經典」與「人類」的旁邊：1994 幼獅科幻文學獎酷兒科幻小說美麗新世界〉，《清華學報》，32(1): 167-202。
- 蔣淑貞（1998），〈兩性戰爭可休矣？當代女性科幻小說的敘事模式與性別政治〉，《中外文學》，26(8): 32-47。doi: 10.6637/CWLQ.1998.26(8).32-47
- 蘇銀娜（2016），〈《珍妮的畫像》：夢幻的外衣和豐富的內裡〉，《電影評介》，22: 65-67。
- Asimov, Isaac (1982). *The complete robo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葉李華譯  
（2014），《艾西莫夫機器人短篇全集（全新修訂版）》。台北：貓頭鷹。
- Braidotti, Rosi (2013). *The posthuma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araway, Donna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張君攻譯（2010），《猿猴、賽伯格和女人：重新發明自然》。台北：群學。
- Hayles, N. Katherine (1999).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賴淑芳、李偉柏譯（2018），《後人類時代：虛擬身體的多重想像和建構》。台北：時報。

Wolfe, Cary (2010). *What is Posthuman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作者簡介

蔣興立，輔仁大學中文所博士，現任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副教授。教授「近現代通俗文學專題」、「華文文學選讀」、「城市與文學」、「小說創作專題」等課程。近期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城市論述、台港小說、性別文學。論著發表於《人文中國學報》《台灣文學研究集刊》《台灣文學研究》、《東吳中文學報》、《淡江中文學報》等相關學術期刊。

〈聯絡方式〉

Email: [hsinlichang@gapp.nthu.edu.tw](mailto:hsinlichang@gapp.nthu.edu.tw)

## Virtual Love in the Posthuman Age: A Discussion of Electronic Lovers in the Science Fiction of Lu Ping and Shi-Kuo Chang

*Chiang Hsin-Li* Institute of Sinophone Studie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The science fiction novels *Recor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ritten by Lu Ping, 1989), *Golden Silk Dress* and *Portrait of Jenny* (written by Shi-Kuo Chang, 1993) explored the emotional entanglements between human males and female robots. Lu Ping and Shi-Kuo Chang further collaborated on an experimental novel *Spy Catcher*, and afterward these two writers separately speculated on gender relations in human-robot romance in the posthuman age; therefore, similar to *Spy Catcher*, the three aforementioned science fiction novels, *Recor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lden Silk Dress*, and *Portrait of Jenny* demonstrated the divergent perspectives of male and female writers on the same issue.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love construction, gender relations, and utopian imagination in the posthuman age through three texts, *Body Narratives of a Female Robot*,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Virtual Love*, and *Gender Utopia in the Posthuman Age*, all science fiction novels. In these books, written near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 seem to see their predictions for the current lonely generation that refuses to reproduce and is emotionally isolated; we may project that these traits will intensify over time and be

realized in the apocalyptic post-human era depicted in this science fiction.

**Keywords:** *Golden Silk Dress, Portrait of Jenny, Recor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ody narratives, gender utopia